◎文学新地理⑫

山东文学：有根的灿烂

□ 黄发有

●艺术观念的革新和开放的文学姿态是开启辉煌之门的金钥匙
●山东作家都深深地植根于脚下的大地，从故乡的自然世界和乡亲的现实生存中获得审美启示
●山东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一种特殊的韧性，在时代风尚的流转中表现出一种审美定力

山东是人口大省，也是文学大省，每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数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山东文学基础扎实，特点鲜明，老中青结合的人才梯队比较合理，各种文体发展较为均衡，建立了一种多元互动的文学生态。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诗歌创作都是山东的传统优势项目。近年的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佳作迭出，夏立君、石耿立和刘海栖、张晓楠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屡有斩获。山东网络文学作家是一支充满活力的新军，风凌天下、高楼大厦、减肥专家等人的创作有大量的粉丝，多部作品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介榜单。在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山东作家获得3个奖项，还有4部作品获得提名，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第一，获奖和提名作品覆盖了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短篇小说、诗歌5种文体，多点开花，显示了山东文学的深厚底蕴。

尤凤伟

张炜

夏立君

许晨

张玉栋

路也

在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今天，回顾山东文学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艺术观念的革新和开放的文学姿态是开启辉煌之门的金钥匙。王润滋、张炜、李贯通、矫健、李存葆、左建明、刘玉堂、苗长水、尤凤伟、赵德发等作家以充满激情的独特探索，开创了新时期山东文学的新局面，奠定了“文学鲁军”的基本格局。他们的创作敏锐体察时代潮流的变迁，敢于创新，又有守正的齐鲁文化中道义担当的一面，在喧嚣的流行风尚面前表现出足够的定力。

王润滋的《内当家》《卖蟹》《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声音》《一潭清水》、矫健的《老霜的苦闷》《老人仓》、李贯通的《洞天》《天缺一角》、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左建明的《阴影》《黄河故道的娘儿们》、尤凤伟的《为国瑞兄弟善后》《石门夜话》、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赵德发的《通腿儿》等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各具特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鲜活的时代进程，叩问人性，探触文化转型中的阵痛与新生。

山东作家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设精神之桥。尤凤伟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命存在，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追问农民与土地、个体与家族之间的关系，都在当代文学进程中留下了个人化的印迹。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等作品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源于其表现的是独特的现实，作品有历史的纵深感，有史诗的特征。作家关注现实要有历史的内涵，不能写平面、流动的现实，优秀的作家写现实一定要有历史反思的意识，有前瞻的意识。

现实主义文学是山东作家的创作主流，这和山东作家关注时代、关注现实的传统有关。深入生活是山东作家开掘现实矿藏的利器，他们走出舒适的书房，通过锻炼脚力来提升自己的眼界，开拓精神格局。从李存葆、李延国、郭慎娟、王光明、牟崇光、彭艳华、贾鲁生到铁流、徐锦庚、高洪雷、王鸿鹏，山东的报告文学作家善于把握重大题材，深入挖掘独特的思想价值与审美内涵。许晨的长篇报告文学《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正如作家叶梅所评价的那样，这部作品的创作有“三难”——“难得”“难熬”“难忘”。作者曾作为一名科考队员随同“蛟龙号”远航，在海洋深处经受大风大浪的考验。

山东的优秀作家在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方面有高度共识，他们重视文化积累，不抄近道，精雕细琢。散文作家夏立君创作《时间的压力》的过程，是一段寂寞、枯燥的漫长时光。他与屈原、曹操、李白、司马迁等先贤跨越时空的对话，承受着汗牛充栋的前人成果带来的巨大压力，为了不沿袭旧说，经常推倒重来，真是十年磨一剑。

山东文学是有根的写作。山东作家都深深地植根于脚下的大地，从故乡的自然世界和乡亲的现实生存中获得审美启示，并以故乡为精神根据地，展开与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多元对话。王润滋写过一篇创作谈《人民是土地文学是树》，他说：“我们的作家应该尊敬农民，学习农民，描写农民。”山东作家正是散布于平原、深山和海滨的树木，他们组成了茂盛的森林，不仅用根须汲取土地中的营养，而且以自己的生命守护这方水土，改善周围的精神环境。王润滋、刘玉堂等作家都喜欢在创作中运用方言土语，这种语言习惯源于他们的农家血脉，寄托了对故土和乡亲的浓烈情感。鲁籍作家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山东本土作家张炜的胶东大地、刘玉堂和赵德发的沂蒙山村、李贯通的微山湖区，既是对故土的描述和追忆，也寄托了作家的文化理想、审美理想，是作家的精神家园。刘玉栋笔下的齐周雾村也接续了这一传统。他的《我们分到了土地》《给马兰姑姑押车》《年日如草》等作品，面向与自己骨肉相连的故乡，将心比心地体谅普通人群的难处。东紫、王秀梅、艾玛、常芳等作家以特色鲜明的艺术探索，从日常细节中发现人性的闪光，用相濡以沫的温暖照亮生活，让平凡的人积极向上，在艰难中不顺流而下，用质朴乃至笨重的方式摆脱精神困扰，逆势走向人性的高处，在琐碎的生活中发光发热。

路也、王黎明、王夫刚、寒烟（刘燕）、韩宗宝、孙方杰、李林芳、阿华、轩辕轼轲等诗人的创作交相辉映，其中既有像露珠滚滚的麦穗一样清新质朴的诗行，也有如同夜空里的星群一样纯粹的光芒，穿透了世俗的尘埃。

从宋遂良、吴开晋、孔范今、陈宝云、袁忠岳、任孚先到谭好哲、李掖平、吴义勤、王光东、张清华、施战军，山东文学评论一直以自己的声音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全国的文学评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更为年轻的马兵、丛新强、张丽军、孙书文、张艳梅、刘永春等以新的批评姿态，介入当代文学的动态进程。

山东作家的写作往往有一种特殊的韧性，在时代风尚的流转中表现出一种审美定力，拒绝随波逐流，拒绝轻易转换自己的立场与趣味，在自己的园地深耕不辍，有一种持续的生长性。另一方面，齐鲁文化既有农耕文明的厚重与丰富，也有海洋文明的开放与包容，这种文化的融合性也赋予山东文学以审美的多样性。王方晨的《老实街》以独特的视角，关注老城在转型过程中的挣扎与两难，写出了这个自成一格的文化空间逐渐碎裂的过程，就像一尊带着裂纹的精美古瓷，在内外多重压力的挤压下缓缓碎裂。张继、刘照如、瓦当、范玮、宗利华、柏祥伟、张锐强、王宗坤、杨袭、凌可新、邢庆杰、闵凡利等一批优秀的小说家，李登建、丁建元、王月鹏、厉彦林、魏新、赵建英、陈原、王忠（简默）、宋长征、林纾英等散文作家，都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探索，在荆棘丛生的荒野中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山东作家的创新不是凌空蹈虚的形式游戏，它离不开对山东文脉的继承与发扬，善于从充满活力的民间文化中吸取精神滋养。也就是说，这种创新有底气，也接地气。年轻的魏思孝、吴永强（老四）、庄凌、徐晓等人的创作长势喜人，呈现出别样的趣味与美感。当然，山东文学要取得新的突破，需要更多具有冲击力的新生力量，以无所畏惧的青春活力摆脱成规，推动文学的不断创新。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山东作协主席）

关切现实重大问题

——刘醒龙近作研讨会举行

□ 本报记者 张鹏禹

近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等主办的“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刘醒龙《蟠虺》《上上长江》《黄冈秘卷》等近作及当下文学创作的趋势展开了充分讨论。

湖北省文联副主席肖伟池认为，刘醒龙是新时期文学重要的代表性作家，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双冠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他成功的关键。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认为，刘醒龙能在每一个历史关头，给社会重大问题以现实关切，记录下了时代最敏感最丰富的神经脉动。诸如民办教师、乡村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都是他作品关注的对象。楚文化品格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从《大别山之谜》到《黄冈秘卷》，刘醒龙是楚文化的文学后裔，其作品中的人物具有“湖北式”人格。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认为，刘醒龙的创作有三大特点：首先是持之以恒，坚持创作。他不是通过演讲、接受采访、作者谈来维持声誉，消费旧有名声，而是坚持小说本位，通过持续不断地观察思考，创作了一部又一部佳作。第二，刘醒龙的创作追求艺术与历史的融合，突破了既有模式，消融了历史的线性化特点。在他笔下，历史不再是延长和延申，而是融合。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新变是刘醒龙创作上的成熟。第三，明确的地方意识与鲜明的中国精神表达。《黄冈秘卷》更加自觉地把地方写成故乡，写出某种意义上的地方史志。当下小说创作，明确的地理方位感是一个特点，但过分狭窄的地方化会使小说格局受到限制。刘醒龙自觉突破地方性和地域性，他表达的主题是开放式的，在文学趋势的趋同性中有自己的个性，表面看写的是地方人的地方性格，作家努力表达的则是中国精神。

《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施战军用“境遇”“根须”“方圆”三个关键词总结刘醒龙的近作。境遇感，指他的作品接地气，具有现实关怀。面对现实塌陷，刘醒龙没有选择跺脚，而是选择迈出步去。根须指的是其创作接续伟大的文化传统。他的想象、虚构无一不是从根须出发。方圆指他的作品有格局，个性的棱角与面对浩大生命时的圆融相统一。刘醒龙是一位心怀家国天下的作家，有整体结构的作家，他不仅是小说家，还是一位诗人。

湖北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认为，可以从一个作家透视出文学发展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分享艰难》等作品对于转型期有担当的基层干部的塑造是前所未有的，被雷达命名为“现实主义冲击波”。2005年的《圣天门口》突出了鄂东革命的特点，全面展现了南方革命的气象。近年来，刘醒龙关注文化问题，从《蟠虺》关注文化人格到《黄冈秘卷》关注地方志，反映了当代文学的趋势性，预示了中国作家努力的方向。

江苏作协副主席汪政认为，刘醒龙不认为过去的风格是自己要坚守和不断添砖加瓦的，而是放下身段，放下包袱，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圣天门口》《天行者》《蟠虺》《黄冈秘卷》这一系列的作品迥然相异，不断出新。刘醒龙不是纸上行走的作家，他行走在大地和历史深处，行走在卷帙浩繁的经典和一个个陌生的领域中。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在闭幕词中指出，刘醒龙的创作成熟于新世纪。1934年，赵家璧先生策划中国新文学大系时距新文学元年的1917年不过18年；1962年，华中师范学院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据当代文学元年的1949年也不过13年。今天，新世纪文学已经走过18年的历史了，是时候对近20年来中国文学创作进行总结了。

刘醒龙在闭幕式上以自己的创作为例，谈了对宿命和命运的看法，“一旦明白所谓神奇不过是自己认知不到位时情绪上的夸张与放大，命运就会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他认为，命运包含了那种发自内心的和解的意愿，《凤凰琴》是宿命的，到《天行者》这里，所有的人物坦然接受各自的人生状态，各自努力生活，努力做好自己，这就是命运。

◎新作评介

老街巷里的云蒸霞蔚

□ 文清丽

王方晨跟我渊源颇深，我和他不仅是同学，还编过他七八篇作品，被文中飞扬的诗性和典雅的文字所迷醉。读了他的长篇小说《老实街》，我忽觉又见到了一个厚积薄发、笔力强健的王方晨。

成书之前，这些短篇均发在全国重要文学期刊上，我最喜欢的是《大马士革剃刀》。不少人以为这是一篇侦探故事。虐猫者谁？细读之，都知道是左门鼻。我却为文中弥漫的情绪而感伤。作者想要表达的是老人的孤独，是人与人之间那把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比较”之刀。陈玉伋的热闹得意更衬托出左门鼻的落寞失落，所以他必须用相依为命的猫，用贵重的剃刀一步步地逼走陈玉伋。不心爱，不贵重，焉能给陈玉伋心里造成极大的压力？焉能让老实街的人们，信服是陈玉伋所为？人性的深暗显现。让我难过的是左门鼻好似胜利了，可他的胜利仍是被陈玉伋的女儿一语击穿。

还有老花头，一个行踪不定的说媒老头。他给编竹匠的女儿说媒，说得体贴而入微。老实街被拆，他第一个签了字。看似令人不齿，半夜却一个人走到一片废墟的胡同，蜷缩在编竹匠女儿遗弃的大竹椅里，让我们想到他给编竹匠女儿说媒的动机，还有内心那不易为人所知的秘密。

编竹匠女儿鹅的形象，刷新了我的阅读感觉。她如老实街上的野花，极尽绚烂，肆意绽放，一扫多数作家笔下，女性为情所累的形象。生了私生子，老街的人们并未鄙弃她，而是用一个古老的传说——践石而娠，为她解围。

全书人物是立体的、丰饶的。鹅需要的一张床，老花头隐性的情感之花，阿基米德兄弟的隐身避世，我想，放在一条古老的街上，更有其丰富的所指。王方晨的小说，故事密码多，线头密布、不时闪现，稍不留意，就会错过。有时可能是一把钥匙，一盘菜，一片叶子甚至一朵花的叫法，器物，手艺，巧妙地给我们展示了那条街的纹理及人物独特的个性。比如剃刀，竟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名字：大马士革。比如阿基米德。王方晨看似站在一条街上，其实他的视野并不局限，目光投向更加丰富的大千世界。他把一条古老的街巷置于时代，置于浩浩宇宙中去考量，去体察。

好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呕心经营出来的，是作者站在内心的制高点上，把自我深深地投放进去，细察众生万物，展现人性、道德之间的纠缠，方显生命之复杂和幽微。

千佛山、大明湖、涤心泉等地名，使小说的地域感明显。唐二海酱菜、文升园的蒲菜奶汤、古盛村的银丝卷……地方风味扑面而来。作者眼观芸芸众生，体恤世情人心。老实街，旧军门巷，鞭指巷上的张宅、穆宅、状元第，汇泉楼、燕喜堂、心佛斋、厚得福等饭庄，使小说在现世中又平添一分古意。汤汤水水，油盐酱醋的世情扑面而来。

作家行文，最忌死板，王方晨的小说如紫藤怒放，灿烂于院墙一角，好似云山崩落。墙外观看，时有风中摇曳的隐约丰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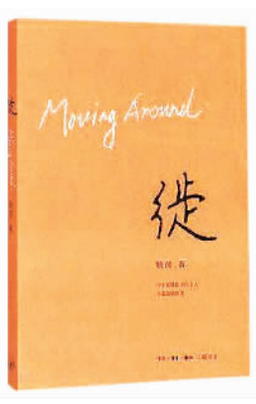
纳博科夫看了《安娜·卡列尼娜》，曾画过当时俄罗斯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火车车厢图，我也好想画出王方晨老实街的图来，可叹非画家，笔力不逮。写到这里，没来由地忽想起同学时，我们在鲁院荷塘边散步，王方晨穿着一条深蓝色牛仔裤，他再三强调，这是第一次穿。那时，是2015年11月，银杏叶铺了一地，灿如黄金。

《老实街》不正是王方晨写作之路上的银叶大道吗？

评论家谢有顺说：“一条自成一格的老街，一座真实、客观的北方大城，浓缩着中国伦理和文化基因的老街上，王方晨力图写出这个道德小世界的解体，碎裂，并由此发现当代都市的情感密码，寄寓时代变迁下的精神乡愁。”我深以为然。

无根的漂泊与华人叙事

□ 郭艳



姚茵是一位多年坚持写作的华人作家，汉语表达是她回溯自己国族经验的独特方式，当然这种远在大洋彼岸的回溯和忆旧带着深深的感伤色彩与复杂的心绪特质。读她的小说，似乎远远地听到《钗头凤》中“莫、莫、莫……错、错、错”的叹息，又时时勾起个人身世飘零的喟叹。在充溢着现代性纠结的都市中，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犹如一句谶语，准确揭示了现代人逼仄的生存之境。

姚茵有着多年的精神病学研究经历，出生地上海独特的地理文化背景，多年旅居异质文化圈的生活经历等因素，让她的写作拥有异质文化、价值和伦理深度交错的特质。.

《无名的凯瑟琳》关涉到伦理、道德和情感等多重维度，凯瑟琳的奉献、忘我与爱带着与伦理道德的纠结，一路前行在俗常人生之旅中。《巴黎之吻》叙写了一个发生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感伤故事，匡米对于荷龙的情感很难说是爱情还是情爱，然而，现代都市经验所产生的现实感和现代人对于艺术人生的飘忽感，让更多都市青年的情感出现不确定性，两性之间的话语呈现出犹疑、茫然和畏缩的状态。“爱”和“爱情”变成了一件奢侈品，在原本可以自由爱恋的时间和空间中，因为莫名其妙的“直觉和冲动”而让爱失之桑榆。《徙》中很多人物的情感都带着浓厚的感伤特质，两性之间无条件的爱情被现代物质生存和所谓的个体自由肢解得遍体鳞伤。

在作者笔下，众多有着抑郁、心理障碍乃至自杀倾向的个体成为叙述和摹写的对象，当下价值建构的错乱和人性脆弱的一面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表露和呈现。可能，当我们窥视人性的幽暗时，我们都是患了现代病而不自知的病人。作者摹写了部分华人群体深度进入异质文化之后，心理和精神方面所产生的裂变乃至错乱。因为作者本人依然从事着专业方面的工作，她的写作是和所在国的现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同步的，由此，她笔下的人物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社会印迹。她所写的是带有鲜明美国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华人、亚裔和各类族裔的移民，这些人物的交往、文化的杂色和价值观念的拼盘在文本中俯拾即是。

姚茵的这部文集细密内敛，带着精神解剖学的冷静和残酷，在淡定自若的文字中，呈现出她所熟悉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心灵境遇。她的写作直接跳过了对于华人生计的叙述，径直奔向属于情感、伦理乃至性心理的幽暗区域。她笔下的华人有着漂泊的现代属性，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在新大陆上以现代人的身份遭遇现代生存的逼压，同时又有着炎黄子孙特有的乡愁和伤痛。由此，她的写作显示出和当下生存直接对应的敏锐以及对于现时代华人心理情绪的深度摹写。

当下，部分华人群体呈现出的心灵镜像恰恰成为整体性美国生活经验某个棱面的象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姚茵的写作显示出与其他华人作家不一样的先锋性和当下性。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